

开放马克思主义“危机—革命”叙事的意义重构

——约翰·霍洛威教授访谈

夏巍 邝光耀 [英]约翰·霍洛威

“开放马克思主义”(Open Marxism)是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中形成较早、影响甚广的一支流派,它倡导建构一种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试图走出“封闭”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方式。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爱尔兰人,当代英语世界著名的左翼批判理论家,长期任教于爱丁堡大学,目前是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的一名社会学教授,他曾是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的重要成员,其著作《裂解资本主义》(*Crack Capitalism*)、《无需夺权改变世界》(*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等被译为十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2023年6月,霍洛威教授在与笔者的线上访谈中,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开放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源流关系,并厘清其与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意大利自治主义传统之间的理论异同。他强调,“开放”意味着将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使用的系列范畴理解为主体斗争行动的概念化,并基于这种批判性重构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革命”叙事。霍洛威教授对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当代资本主义不稳定性作出了批判性思考。

一、“开放”何谓:“开放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源流关系

夏巍(以下简称“夏”):“开放马克思主义”是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中形成较早、影响甚广的一派。作为英国“开放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我想首先听听您是如何定义“开放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其中

作者简介:夏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邝光耀,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约翰·霍洛威,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唯物史观发展的原创性贡献研究”(项目编号:22AKS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的“开放”这一核心概念？您的好友维尔纳·博内菲尔德（Werner Bonefeld）教授在接受中国学者孙亮的访谈时^①，把“开放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重构，并明确它的主要目标是摆脱因循守旧、缺乏创新力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教条。您认同这一说法吗？您认为这一理论流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较而言，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约翰·霍洛威（以下简称“霍洛威”）：对我来说，“开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实际上有两个层次。首先，我完全同意博内菲尔德的说法。“开放马克思主义”是在当代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变化的全球局势下，致力于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理论何以继续可能的一种理论尝试。我认为，直到今天，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坚持共产主义革命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灵感源泉，而历史上的某些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已经阻碍了思想彻底变革并与变化发展着的现实相适应。对此，我们没有明确具体的答案，但我们必须继续发展对于问题本身的探索，继续寻找前进的方向，进而寻求如何彻底摆脱资本主义这一条必然通向全球性人类灾难的道路。“商品—价值—货币—资本—灭绝”，这就是我们此刻正在面临的可怕逻辑。如果社会关系一直是建立在资本主导的商品交换基础上，那么就会形成一种最终将我们推向灭绝的整体动力，其核心是资本积累。对利润的无节制追求促使资本不断破坏人类生存的自然前提。近年来，这一点在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使得农业“工业化”，破坏了生物多样性，正是所有这些起因于资本积累和利润增殖的生态破坏，为某些全球性流行病创造了基础；另一方面，对利润的追求导致化石燃料等不可再生能源的无节制使用、城市化扩张发展带来交通堵塞和大气污染等等，最终引发了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在这两种情况下，虽然有的国家采取行动限制资本积累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但事实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竞相促进最有利于自己的资本积累条件，这意味着那些以国家形式采取的节制措施并不是根本有效的。只要基于资本的商品交换仍然是支配人的活动的主导形式，那么世界将继续受到资本积累规律的统治。

其次，“开放马克思主义”还有着第二方面更确切的含义。“开放”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使用的一系列概念范畴理解为主体斗争行动的概念化，换言之，将其理解为本身存在自否性和对抗性的动态范畴。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价值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即在资本权力支配下人与人之间相互产生联系的一种方式——无论它是否通过日常的阶级斗争被创造或重建。但我们不禁要问，在全世界范围内，不知每天有多少人仅仅因为价值交换控制了他们获得食物

^① 参见孙亮：《“开放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重塑——沃纳·博内菲尔德教授访谈》，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5期。

和药品的机会而死去?这个数字很可能是成千上万的。然而这些人是自愿去死的吗?当然不是,是因为他们处于社会关系中被压迫的境地,他们往往只能通过偷窃或建立各种形式的联合团体来对抗基于价值交换而形成的不平等社会关系。因此我认为,这种不平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决不能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它总是而且一定是有争议的。无论是“金钱”“资本”“租金”“国家”等抽象范畴,还是“第三世界”“墨西哥”“足球世界杯”等具体概念,也许还有其他名词,都是如此。如果我们将这些范畴视为资本拜物教形式支配下社会关系的呈现,那么这种拜物教在社会革命彻底成功之前决不会消失,而是相反,资本拜物教和社会革命的失败主义倾向将一直处于冲突矛盾之中。

邝光耀(以下简称“邝”):“开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倾向同许多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思潮一样,在理论上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二分理论体系:在实践倾向上则高度关注主流无产阶级革命叙事以外的新社会运动,探索多元化的革命主体何以可能。基于这种家族类似性,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开放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关联?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从属或包含关系吗?

霍洛威:严格来讲,我并不认为“开放马克思主义”属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种理论分支,而且我的确不喜欢“新社会运动”这个概念,我也不认为革命主体在现实中是多元的。但也许我应该试着对此加以解释。之所以将“价值”“金钱”和“资本”等范畴视为一种动词意义上的动态化过程,就是要将其理解为对主体生活与行动的持续性侵略。换言之,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就是对工人、对所有人类乃至对所有生命形式的持续性侵略,这种侵略给绝大多数人带来的是悲惨的生活条件,并日益将物种生存威胁到灭绝的境地。价值、货币和资本主导的侵略过程不断攻击我们,与此同时,我们也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抵抗和反对资本的入侵,例如,拒绝日常工作、组织工人罢工运动、反对加剧全球变暖的国家政策、推动创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区域,等等。这些行动都是对资本动态破坏性的抵抗和反叛运动,即使他们可能并不以这种方式理解自己行动的自觉性。因此,当我们在谈论社会运动的多样性时,并不是片面强调所谓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新社会运动的差异,而是要意识到这种对任何革命希望而言都至关重要的侵略与反叛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第二国际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人们倾向于将阶级斗争理解为两个特定阶级群体之间的冲突。但我认为,理解阶级斗争最好的方式是将其视为价值生产关系中必然存在的主体对抗运动。当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革命主体——无论是将革命主体浪漫化或本质主义化,还是将革命主体与渗透它的对象隔离开来,抑或将这个主体视为工人阶级、土著、妇女或黑人,都注定会导致幻灭的结局。因为客体(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整体)总是渗透到主体中,但从未达到完全吸收的程度。历

史告诉我们，革命主体确实已受到破坏，但远远没有被摧毁。思考革命的希望不是寻找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来拯救我们，而是寻求内在的否定，即一种源于自身又溢出（overflow）自身的内在性否定力量。这种否定将自身受损的主体性溢出，变成呐喊、对抗和反叛。我们仍需寻找资本主义的现实“掘墓人”，但绝不是作为特定的阶级群体而存在的“掘墓人”，而是作为一种潜在性、颠覆性的力量而存在的革命主体，它不仅以火山的方式破坏资本主义“地表”，而且还将以慢性疾病甚至可能致命的疾病的形式存在于资本的“地壳内部”。

邱：您是否认同拉克劳、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著中所开创的走向激进多元民主政治的方案及其革命策略？具体来说，就是他们主张的新社会运动主体领导权的联结和多元民主话语的激进革命面向。从今天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新社会运动（如美国的黑人平权运动、法国的“黄马甲”运动、“LGBT”群体平权运动，等等）似乎大有被资本逻辑包围并被新自由主义吞噬的危险。

霍洛威：不，我完全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彻底打破资本逻辑的支配和货币统治的力量。资本和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强迫主体行动的社会力量，它驱使我们以某些不受主体控制但正在摧毁人类自身生存条件的方式行事。因此，出路就在于我们必须找到打破这种行动强制的方法。事实上，全球各地的人们已经有数百万种方式试图打破这种金钱至上带来的行动强制。

然而我也认为，所有这些抵抗运动都不断面临被资本吞噬的危险。通过商品交换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我们被推入某一种被规定的身份角色，这种身份如同面具一般被戴在脸上。面具是一座监狱，它把我们封闭在一个固定的角色中。交换者不再被视为一个个有爱、有记忆、有激情的人，而只是一个角色、一个商品的卖家或买家。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我们都潜在地服从于一个个固定的身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个体的社会身份被构建为资本逻辑链条中的特定角色：“我是汽车销售员，我是教授，我是墨西哥人”，或者“我们是工人阶级，我们是女人，我们是土著人”。所有这些自我介绍肯定都声称自己说的是实话，都表明了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或地位，然而，这些身份否定了“我们”自己作为主体的个性的丰盈。所有关于身份的陈述都呈现出一种否定非同一性的同一性，正是这种否定非同一性的同一性运动构成了我们的主体身份。因此，最重要的是要在理论上表明，无论何种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本质上都是抵抗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或者我们可以说，让这些社会运动的影响力不断扩散是很重要的。例如，“我们正在为‘LGBT’群体的跨性别权利而斗争”，这在本质上意味着“我们同时正在反对制造身份歧视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正在为反对环境破坏、保护地球的生物多样性而斗争”，这意味着“我们同时正在反对破坏其他物种生命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些在运动中被讨论的句子的第二部分，那么这些运动将很容易也极可能被重

新吸收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动力中。

二、重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批判理论、非同一性与自治主义

夏：您的“开放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作如《裂解资本主义》《无需夺权改变世界》等已经翻译成十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包括日本韩国等亚洲地区）广泛传播，并在不同程度上对左翼新社会运动产生了理论影响。据我所知，您的一系列理论主张主要受惠于四方面的思想资源：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与非同一性理论、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与“国家衍生”争论、意大利的自治主义传统、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萨帕塔”自治主义运动。请允许我们向您逐个提问。首先，您为何认为有必要以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非同一性要素来取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黑格尔因素呢？要知道马克思明确表示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①。

霍洛威：这的确是个很好的而且对理解我的理论而言很关键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我并不认为我所做的引入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理论的工作是在强调有必要彻底取代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辩证法因素。我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本身蕴含的黑格尔色彩，我所反对的是将辩证法再度“黑格尔化”，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封闭化体系所带来的对革命未来幸福结局的必然承诺。

“开放马克思主义”认为辩证法理论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一般理论，而是专门关注人类作为主体的社会关系互动的非同一性理论。我引入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以理解这种非同一性，因为阿多诺强调“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②，这种非同一性打破了黑格尔化的同一性辩证法导向综合封闭性的概念，也打破了所有承诺必然性的“幸福结局”的概念。如阿多诺所言，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原子弹爆发之后，当今世界充斥着野蛮，但希望就在于社会关系的非同一性流动，在于固定性和同一性身份的打破。

为什么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概念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必须辩证地思考社会主义革命与超越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问题。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清醒，针对资本的斗争不只是为了完成线性进步的历史轨迹，而是为了彻底阻断它驶向毁灭的前方未来。如果说当前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历史是一列正在带我们走向灭绝的火车，那么正如本雅明所指出的，我们的行动斗争不是为了推动火车继续前进，而是奋力拉动紧急刹车的火车制动阀。

夏：谈到阿多诺，我还想和您谈一谈他曾经的得力助手哈贝马斯，在您过去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4 页。

②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 页。

著作中，似乎没有发现您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的批判理论有任何评论或联系。但据我所知，您和哈贝马斯都在不同程度上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政治哲学的“空场”或危机，并且在不同路径上对资本主义的危机现象作出了批判性解释——哈贝马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生活世界”方面去剖析其合法性危机，您则是从资本主义“裂缝”(cracks)与劳动二重性方面去批判其自否性危机。请问您如何看待哈贝马斯的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批判理论呢？您又是如何看待他为资本主义社会开出的交往理性治疗“药方”呢？

霍洛威：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有趣，但严格来说，我并不觉得我的资本主义危机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系统—生活世界”的危机批判理论有一致的理论旨趣。据我所知，哈贝马斯虽然曾经短暂担任过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所长，但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批判理论学者有着明显的理论立场决裂。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第一代批判理论家是从超越、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待、批判资本主义，尽管他们有时对这种超越的可能性并不十分乐观。我认为，哈贝马斯后来完全放弃了这种观点，他不再试图从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角度进行批判性思考。我和他恰恰相反，我的立场是，无论我们可能感到多么悲观，无论真正超越资本主义是多么困难，这仍然是所有真正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必须坚持反思的中心问题。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资本权力对主体的动态“编织”(weave)总是如此地具有灾难性。因此，留给我们的唯一具有真正科学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走出资本权力支配社会关系所带来的根本性困境？

具体而言，我通过批判理论理解的不仅仅是一种停留于批判现存社会的病理学方法，而是一种试图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潜在的克服可能性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从而将我们带入一种不同的革命“语法”(grammar)。总是从不可能性的角度去思考革命是没有意义的。批判理论要向前发展，至少必须有想象与资本主义决裂的可能性的勇气。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可怕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希望真的有现实可能吗？我们真的认为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即一个不以资本和货币的力量为基础的世界吗？我们决不能把自己封闭在充满挑战但舒适的批判性的理论世界中，我们还必须不断地问自己：批判性思维有真正的基础吗？我们真的能想象打破资本主义统治，继而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吗？

邝：您的回应非常精彩！第二个问题是，您能否为我们介绍“开放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权力批判理论与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国家衍生”争论^①

① 国家衍生争论：指自1971年持续到1977年，以沃尔夫冈·穆勒和克里斯特尔·诺伊西斯发表《福利国家幻象与劳资矛盾》一文为导火索，以法兰克福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不莱梅大学为中心，以《阶级斗争问题》(PROKLA)杂志和苏尔坎普出版社为平台，在德国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福利国家关系问题的一系列的理论之争。

有何渊源？您在将德国“国家衍生”争论介绍到英语世界时指出，国家只是资本关系的一种形式。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并非仅仅指出了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过程，而且在于指出了阶级斗争往往在不同历史社会语境中会采取不同的形式。现代国家就是这种资本关系的形式，国家理论的起点既非在政治的特殊性中，亦非在经济的支配之中，而是在关于资本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之中。我比较好奇的是，时至今日，您仍然坚持“无需夺权改变世界”这个主张吗？

霍洛威：20 世纪 70 年代初，作为对西德第一届社会民主党政府行政干预的回应，西德学术界出现了关于国家是否由资本所衍生的辩论。一开始争论的问题是：“左翼政府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能达到的极限是什么？”或者换言之，“是什么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得以成为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国家？”沃尔夫冈·穆勒和克里斯特尔·诺伊西斯在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①中首次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理论突破，即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形式出发，将国家理解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形式。资本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为何它使国家得以成为一种明显持中立立场的社会关系形式？这引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人们意识到俄罗斯法律理论家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②

不久之后，来自英国的一群学者试图继续理解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并超越先前米利班德和普兰察斯之间的辩论，而发生在德国的这场辩论对我们来说在理论上非常重要，所以索尔·皮西奥托（Sol Picciotto）和我在 1978 年出版了一本书——《国家与资本》^③，这本书可以说对德国的“国家衍生”理论之辩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一年后，我又写了一篇题为《国家与日常斗争》的文章^④，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国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更是一种塑成对抗化社会关系的形式化过程，即一个形塑社会对立以使其与资本的再生产相兼容的过程。因此，国家的本质是一个反对“反国家组织”形式的斗争场域。这可能就是我与后来被称为“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理论主张相决裂的地方。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将国家理解为资本关系的一种形式（如价值、金钱、租金等），那么我们就决不能将其仅仅视为一种保持社会性中立的形式。与此相反，它是一种特定的由资本权力所支配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因此决不能成为革命者引入反资本主义运动的组织基础。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反国家的新的组织形式，如集会、公社、委员会等，这

① Wolfgang Müller, Christel Neustüb, *Die Sozialstaatsillusion und der Widerspruch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 PROKLA, Sonderband 1, 1971, S. 57.

② 参见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杨昂、张玲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

③ 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 (eds.), *State and Capital: A Marxist Debate*,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④ 参见 John Holloway, “The State and Everyday Struggle”, in S. Clarke (ed.), *The State Debate*, London: Macmillan, 1991.

些组织形式并不像国家组织形式那样排斥人民，而是寻求表达人民的意见和愿望。

夏：第三个问题是，您曾经明确将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的自治主义主张称为“肯定的自治”（positive autonomy），而把自己的自治主义理念称为“否定的自治”（negative autonomy）。^① 驱使您作出这个理论区分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另外，您认为“否定的自治”主张与哈特、奈格里的“肯定的自治”相比，最大的理论优势是什么？

霍洛威：我对特隆蒂、奈格里等来自 20 世纪 60 年代意大利自治主义运动及其理论传统的学者，以及哈里·克利弗（Harry Cleaver）等其他自治主义理论家有着强烈的理论亲和感。在我看来自治主义方法的最大优点在于，它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统治的运动是由工人阶级斗争的力量驱动的。在政治上，强调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当然具有明显的吸引力。然而，意大利自治主义运动只从外部关系的角度理解劳动和资本，未能探索到劳动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内在本质，导致其分析低估了劳动的抽象化在资本主义形式中的存在程度。我的观点则认为资本主义形式中抽象劳动的存在，同时意味着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地位和资本的内在脆弱性。因此，忽视劳动与资本之间辩证关系的内在本质，就意味着既低估了劳动者在资本中的受约束程度，从而高估了劳动力之于资本的对抗性力量；也意味着低估了劳动者作为资本内部矛盾的决定性力量，因而高估了资本对劳动者的收编性力量。

从共同点上说，我们都坚持从斗争出发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我们的不同点来自略有差异的理论传统：我受到了卢卡奇、布洛赫、阿多诺、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家的强烈影响，他们都强调否定性运动的重要性。对我来说，一个重要问题是：理论方法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后果吗？“否定的自治”和“肯定的自治”之间的区别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的感觉是，“肯定的自治”方法可能导致自治空间的同一封闭化趋向，如走向基于社交中心、家庭职业等为中心的斗争运动；而且它还可能导致只关注工人争取民主的斗争，而不是致力于从根本上废除资本的制度性支配。“否定的自治”方法则更为不安、更为彻底，它试图发展一种不断突破极限的反同一性方法，并将废除资本视为这一社会组织形式的必要目标。只有通过理解“‘他们’不是‘我们’的外部，资本不是劳动的外部”^②，我们才能彻底理解资本主义统治的脆弱性。超越“他们反对我们”的外部性，同时也超越了后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激进多元民主理论，转而重新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革命性，即从行动上理解压迫的脆弱性，并将其理解为我们革命突破的力量。

① 参见 John Holloway, Fernando Matamoros and Sergio Tischler, *Negativity and Revolution: Adorno and Political Activism*, London: Pluto Press, 2009.

② John Holloway,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The Meaning of Revolution Today*, London: Pluto Press, 2010, p. 176.

夏：最后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您目前依然在一所第三世界的地方大学（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任教。就以您的实际体验和亲身了解而言，如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萨帕塔运动这种群体实验的自治主义空间，有任何在全球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复制的可行性吗？马克思主义又应当如何与这些自治主义的空间和时刻联系起来呢？

霍洛威：是的，我至今还在墨西哥普埃布拉大学教书。细算起来，我已经在这里任教长达 30 年了。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任教 20 年后，我在 1993 年来到了普埃布拉，并在这里教授社会学相关课程直到今天。从第一天来到这里，我便发现普埃布拉是一个非常刺激且令人振奋的工作场所。基于对资本主义批判意义上的日常经验批判思想在这里非常流行。是的，正如你所说，恰帕斯州的萨帕塔运动离这里不远。在过去的 30 年里，萨帕塔主义一直是我理论工作中的一个非凡的灵感来源，其中包括他们对自治主义共同体践行意义上的实际重组，以及他们在重新思考革命意义方面的惊人创造力。他们的口号“反对金钱至上的生活”表达了全世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核心诉求。

你问到“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与这些自治主义的空间和时刻联系起来？”，我认为关键概念是“去整体化”（detotalization）。资本主义是一个对社会关系进行整体抽象编织的体系，它将我们所有人都编入它的动态统治中，与之斗争则是一场去整体化的斗争，是一场彻底摆脱这种编织动态的斗争。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看作承载着对抗性社会关系的整体，它是一个系统，或者说是一种紧密的社会凝聚力，其中价值（或抽象劳动）是起关键作用的联结力量。但事实上，它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是一个不断趋于整体化的动态过程。我认为，资本主义是一股强大的综合凝聚性力量，将我们不断吸引到其利润增殖系统的逻辑中。在如今的处境下，我们不得不把革命视为一种去整体化，即视为一种脱离资本整体化过程的革命。革命的本质应当是持续性的运动，它告诉我们：“不，我们不会接受价值的总和，我们将创造一个由我们自己塑造自己的不同社会。”因此，革命不是简单地夺取政权，不是多场夺权式运动的总和，而是一场迂回性的运动，一个以各种非同一性方式脱离资本的累积过程。正如萨帕塔主义者所说，其目的是创造一个由多样化世界组成的共同世界。

三、从理论到现实：重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叙事

邝：曾任国际黑格尔协会会长的意大利已故著名学者多米尼克·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诞生、死亡与重生》一书中，曾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沉浸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逻辑批判的主流叙事之

中，客观上却造成了对被殖民地及被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忽略，这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具有严重的非现实性。^①您认可洛苏尔多先生的这一批判吗？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应当将更多理论目光转入第三世界？

霍洛威：一方面，我认可他的看法。是的，毫无疑问，目前人们过于关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另一方面，我也认为，我们不应该过度区分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我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清楚的是，资本主义是一种正在摧毁整个人类世界的动态侵略性过程。资本市场上的货币流动对世界各地都有直接的破坏性影响。因此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资本主义对人类和其他物种生命形式的威胁都一样紧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资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类的无差别攻击，而不是对基于不同领土划分的不同人群的攻击。所以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在我们对抗资本主义的反应中重复这些领土分歧。

邝：事实上洛苏尔多先生还在这本书中批判您的“无需夺权改变世界”的理论主张，认为这一口号在本质上是走向了一种“宗教出路”。包括我们在研究您的理论动态的过程中，了解到还有不少学者，如科尔姆·麦克诺顿（Colm McNaughton），批评您的危机理论中的阶级观念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即无法充分解释经常跨越乃至颠覆阶级斗争的民族主义问题。其他一些学者则批判您的自治主义主张缺乏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以及“我”与“我”之间如何克服差异成为“我们”进而建立联合体等。您如何回应这些批判？

霍洛威：当《无需夺权改变世界》首次出版时，我对它所受到的一波又一波的批评感到惊讶，或者说既感到惊讶又感到高兴，因为我的意图从来不是告诉人们如何具体进行革命，而是表明为何革命在今天至关重要和十分紧迫的，因此我们必须思考它在今天意味着什么——我们很多人今天甚至已经不再知道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尽管很多人不同意我在书中的一些论点，但我认为这本书非常成功地让人们思考了这个问题本身。有人会批判我的革命方案丧失了组织维度，然而，如果我们把革命本身视为一个开放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现成的答案，其实我们就已经在考虑不同形式的组织的可能了。

通过这本书我想要告诉人们的是，如果革命本身是一个开放性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打破主导革命运动的等级制独白传统，并转而思考在集会、公社、联合体等不同场合提出问题的集体性过程。这远不仅是一位大学教授的主观想法，而已经是世界各地抵抗资本主义和社会运动中存在的强烈现实趋势。正是这种与反资本主义斗争倾向的真正内在联系，让我相信它不只是一种“宗教出路”。我同意那些认

^① 参见多米尼克·洛苏尔多：《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诞生、死亡与重生》，李凯旋、李赛林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22年版。

为我没有太多关注民族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同一主义的真实力量的批评性意见，但这是因为关注的主要问题不是“为什么革命是不可能的”，而是“尽管如此，我们还能思考怎样废除资本主义”。关于组织形式这一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我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详细的答案，但我也认为没有任何现成的答案，答案是在每一场运动自身发展和落地实践过程中形成的。

夏：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中国学者的理论质疑，包括长期与您保持联系的中国学者孙亮，同样在一些发表的论文中对您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①：一方面他认为，危机与革命的真正根源仍在于客观物质基础，因此如果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结构无法得到改变，仅号召人们自行从抽象劳动时间中逃离注定只能是一种幻想。由此他认为，您这种过于理想的资本主义批判与改造方案同时也消解了原先马克思基于夺取生产资料所有制前提下阶级斗争理念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他指出，您借助阿多诺“否定”概念建构的反对资本逻辑的“呐喊”行为策略具有刺激资本逻辑批判方式的积极作用，但反权力而不反政权的革命方案实际上无法真正触动来源于生产方式对立性质及其生产界限的资本主义危机本质，其方案的本质乃是一种建立在不终结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犬儒式的逃避。您如何回应来自中国的这些理论批判呢？

霍洛威：首先，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听到来自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批评。由于这些书的目的本就是公开辩论，因此这些批评当然给了我很大的乐趣，尤其是在中国听到这一点，这为我打开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新维度。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同意孙亮的所有批评。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出发点可能都是认为资本主义是一场灾难、一场人类悲剧。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摆脱它？对于今天而言，我认为，我们必须从资本主义对我们生活与行动日益增长的入侵的愤怒感开始，尤其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和当前新自由主义危机日益严重的变化背景下。这种变化以各种不同方式表达出来，在反对气候变化的运动中，在反对劳工剥削的运动中，在集体愤怒的社会爆发中——正如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在法国街头运动看到的那样，也在许多个人和集体试图逃离资本逻辑的行为中都可以看到，如此等等。

现在很多人可能会说，所有这些试图打破资本主义同一化逻辑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最终人们将被迫回到资本主义系统中。也许这是对的，因为资本同一化的整体力量是巨大的。但我仍然坚持认为，主体行动抵抗和集体反叛的力量，以及基于捍卫人类尊严的抵抗力量也是同样巨大的。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的抽象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引起反抗的对抗性过程，因此是一种总是遭受非

① 参见孙亮：《从“同质性”的抽象劳动时间中“撤离”——对约翰·霍洛威激进政治理念的阐释及反思》，载《理论探讨》2017 年第 6 期。

同一性抵抗的同一性力量。当然,我们可以说生产方式及其生产边界的对立性是必然的,但生产方式本身是人类创造力的表现,“生产边界”却可以用金钱力量来加以衡量。从危机到革命的可能性,是人类创造力(或社会性财富)与资本权力之间冲突的表现,革命的本质乃是一种通过反抗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统治来表达的社会冲突。

邝: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您认为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对中国而言,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又有哪些必须警惕的陷阱?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发展模式又对他们有哪些启示呢?

霍洛威: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还没有去过中国,更没有在中国生活过,因此我认为自己还没有足够的资格去完整地回答它。我想说的是,无论是墨西哥人、爱尔兰人,无论身在何地,更无论何种人种,我们都面临着打破资本逻辑的迫切要求。我认为,我们目前必须接受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具体做到这一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您和我所做的工作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去发现既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模式,又适合本国国情和本土特征的发展道路。

夏: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您的研究视角来看,要使马克思的理论在当今时代仍具有生命力,我们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尤其是如您所言,身处象牙塔之内的理论研究者,能够做什么?

霍洛威:“危机—革命”是“开放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心,批判资本主义危机与其说是一种经验表述,不如说是一种理论选择,因为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而是它的不稳定和脆弱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经验性批判,而是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辩证性理论。我们在象牙塔里能做什么?我认为行动很重要,但同时我也认为将我们在大学的理论活动视为具有政治意义的行动也很重要。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并认真对待我们所有人都会面对的科学问题,并从认识到现在眼前只剩下唯一一个具有紧迫性的科学问题开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在资本主义彻底摧毁我们之前彻底摧毁它?

(责任编辑:韦海波)